

317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青云直上

——施罗德传

冯云峰 编译



A1002519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施罗德是谁？	(1)
童年和青年时代	(4)
寻找偶像的时代	(9)
统一青年社会民主党	(14)
第二次当选	(25)
议员	(31)
汉诺威策略	(42)
挑战者	(51)
下萨克森州新总理	(65)
红绿联盟总理	(80)
1993 年，候选人之争	(94)
汉诺威的“绝对的施罗德”	(100)
赫尔穆特·科尔的经济部长	(105)
1995 年，候选人之战	(116)
玫瑰之战	(129)
寂寞之狼，还是自恋狂的公众人物？	(137)
汉诺威的辉煌胜利	(152)
再问一遍：施罗德到底是谁？	(171)
在权力顶峰	(184)

施罗德是谁？

1998年9月27日是星期日，下午6点整。波恩的选举演播室里，乌厄里希·德芬多夫扫了一眼刚刚递到他手上的条子，清了清嗓子，然后说道：“尊敬的观众朋友们，投票站已经关闭，刚才我们谈了对今天联邦议院选举结果的第一轮统计结果。正如我们所说的——这还只是一个初选统计。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等待紧随其后的正式结果吧……”

成千上万人在荧屏前屏住了气息，将杯子放到一边，手也不再伸向小咸点心。那个早就一直谈论着的波恩内阁的变更终于出现了吗？赫尔穆特·科尔终于要卸任了吗？新的联邦总理会是那个叫格哈德·施罗德的人吗？最要紧的是：格哈德·施罗德究竟是谁？

这本书应该——并且也能够——当然只是尝试着，给出最后那个问题的一个答案。我准备在以下几个方面详加描述，是何种生活和工作造就了这个社会民主党的首席候选人在今天表现出他的一切：把一个特征鲜明的“社会民主的新模式”在各种各样的重要职位，比如青年社会党联邦主席、联邦议院议员以及下萨克森州州长的职位上击败了党内所有的反对力量推行下去，并在1998年4月17日召开的莱比锡社会民主党大会之后，开始推进到整个上层机构，并最终入主联邦政府内阁。

施罗德跟别人完全不同；至少跟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人差别很大。社会民主党内伺机崛起的新生力量最初的“本能”就是

——从政治的机变来看，这是一种情况；而从实用主义的权力直觉来看，却完全可以作另外的评价——彻底抛弃那些温和的阶级斗争论带来的一直笼罩社会民主党的乌烟瘴气的最后残余，施罗德是一个“勇敢的‘政治动物’”，在别的情况下并未过多接近他的一个党内朋友厄尔哈德·依泼勒（Erhard Eppler）对施罗德如此评价：一个政治动物，靠本能行事，有着极其灵敏的感觉，能随时嗅到猎物的踪迹，而且，有点让人不可捉摸。施罗德曾经认为，从蓝领工人到经理阶层看似针锋相对，实际都为着德国企业主的地位能够维持下去这一目的而服务。这正如他的政党，需要一个舵手，同时也要从大多数党中挑选出被他定义为“新的中坚”的一股力量。在生育、工业和核能问题上他的盟友们经常如同演戏般表演出来的抨击并非属于他的东西；相反地，他被看做“机器人”以及能源垄断组织的合作伙伴。而从前的反军备竞赛的追随者们也并不畏惧军事工业的力量，如果它仅仅是用来提供工作岗位的话。施罗德，在最后一个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垮台15年之后，重新成为社会民主党新一个轮回的“缔造者”；或许也是第一个处于焦点位置上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他不再代表那一类家庭教师兼保姆型的尸位素餐的政治家，而是体现出了崭新的、柏林共和国式的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向实用主义倾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转变。

那么，施罗德是一只善变的啄木鸟吗？过去他被看作左倾的“资本家的死对头”，而今天他在党内更多地被看作“右倾的新自由主义者”。在他身上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呢？也许是因为“实践而后知不足”的经验主义教条在每一个实质性问题最终指导着他，是持哪一种观点才能更好地贯彻到底？或者是因为政治责任心上的经验使他成熟，不断地学会处理各方事务？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改变不是出于机会主义，而是完

童年和青年时代

社会民主党拿出来的只是这样一些粗线条勾勒而成的简历：出身农家，在工人环境中成长；父亲，市集里的帮工，在战争中阵亡，母亲，独自把他拉扯大，靠做清洁工艰难度日，最终却再婚了，并且又生了几个孩子；他曾“长年累月对塞玻璃窗缝的油泥恶心不已”，他在后来半开玩笑半夸张地回顾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国民中学，学徒见习期，然后再培训；最后是成效卓著的大学学习。同时，这位下萨克森人在大学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青年社会党主席直至……

隐藏在传说背后的是真相。简要地说：这位“下萨克森的施罗德”是从1946年以后就归属联邦新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一个小城镇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格哈德·弗里斯·库尔特生于1944年4月7日，这一天正好是耶稣受难节，处在二战时期，位于德特莫尔德县和威斯特法伦州的边界地带的莫森贝格。他母亲爱丽卡·施罗德在租住的这个家族农庄的一间小房间里于星期五分娩。他父亲应该从没有见过这个婴孩；3天或者4天后弗里斯·施罗德，工兵二等兵，“为了元首、人民和祖国”，阵亡于罗马尼亚，与此同时他的寡妇一定收到了联邦国防军的格式统一的通知，“他待我很好”——除此之外，他儿子无法从自己母亲对父亲的叙述中获悉更多的信息。

在那个战争结束后接踵而来的饥荒岁月里，这个寡妇和“格尔德”（当时30出头的人公开地这么称呼他，他最亲近的

全面对实际情况，并不断地作出自我修正的结果。格哈德·施罗德的思路，精彩纷呈的表面现象之下是受其强烈个性色彩主宰下的并不那么精彩的政治风景，人们按各自的立场可以从中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这本书不会只提供一种评判，而是想把没有一点偏见的声音包括施罗德本人的观点，各种媒体在各个时期对他的政策的评论，他的朋友和他的政敌的看法都和盘端给读者们，但首要的是在所有评价的基础上让事实自己呈现出来，对于施罗德，笔者尽管只是偶尔跟他有过交往，但多年来一直抱着一种坦诚的心态和没有任何偏见的兴趣观察他，这样才能在最后的章节里给出一些结论。这样一个人，对赫尔穆特·科尔而言是一个“没有丝毫个性的挑战者”，而社会民主党尽管反对他却仍旧让他做自己的候选人，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应该抱何种企望呢？甚至对于许多他的党内伙伴而言施罗德也时不时干着一种“背叛基本原则”的事情。但对国民中的大部分而言，这个“民族的宠儿”（《南德意志报》语）却展现出了改革的希望和一个新的开端，有点儿像比尔·克林顿，也有点儿像托尼·布莱尔，至少也是一个杰奥瓦尼·特拉帕托尼，人们虽然还不能确切地理解他所要做的事情，但由衷地高兴，因为他能够把拳头砸在桌面上高呼：“朋友们，干杯！”

格哈德·施罗德是 20 世纪末媒体民主时代的一个奇迹，是平淡无奇的政治世界里的一朵奇葩，他的青云直上之路简直令人神往，谁要是想对这位就要入主内阁的新总理品头论足，谁就应该搞清楚攀登路途中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路标。

朋友和熟人直到今天还这么叫他)以及比他大5岁的姐姐古恩希尔德一起住在伯克斯顿一间带有那个时代特色的简陋棚屋里,棚屋正对着当地足球场的角旗处。现在汉诺威96的监事,中学时作为强力中锋在TuS球队见习(那时就被取了个叫“农夫”绰号),并在年轻时随那只球队征战地区联赛,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当球撞击木板墙时,煤油灯便从墙上跌落下来。但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很早就在足球场上学习更快更好地踢球。”这对他而言非常重要,他曾经“像你们的黑人从事跑步一样踢过足球——从个人需求到得到社会承认”,很多年以后他对一位美国参议员这样讲。因此,面对人无法自由选择的情形他总是很愤怒。“那时从我们村子里出来的其他人中,无论如何从技术上讲,总有一个比我强的。”作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家他还总是很乐意参加那些知名的聚会。直到几年前他才因为怕有受伤的危险才停止了这些活动。

母亲爱丽卡·施罗德早晨大约5点左右起床,照料古恩希尔德和格尔德,然后徒步三四公里,到工厂工作到深夜或在附近清理房屋和商店。用餐时间非常局促,债务非常重,收入极少,就这么日复一日。法警常为送传票敲响各个房门,里面都住着像施罗德一家那样的人。有时祖母过来“组织烤肉”:她沿着这些房屋的墙根推着婴儿车。当哪个打开的窗户里晾着一块肉,马上就被她拿下来藏到手推车里。战后德国残酷的现实,在施罗德的记忆中作为社会的病态表现出来。

战争结束两年后,1947年,爱丽卡·施罗德嫁给了帮工保尔·法色勒并改姓了福色勒;古恩希尔德和格尔德仍然姓施罗德。爱丽卡和保尔·法色勒生了三个孩子:洛塔(生于1947年4月5日),海德罗斯(1950年3月21日)和伊尔斯(1954年12月22日)。“格哈德·施罗德和他的新妹妹们的关系很好,但同他的继父关系很坏”,贝拉·安塔和罗尔夫·克莱纳在施罗

德传记中这么写道，并引用这位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话说：“我的继父是一个极端敏感的人，他常常做梦，我能感觉得到，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对政治也很敏感。每天晚上他常通过收音机收听沃尔法冈·格龙纳的柏林卡巴莱（一种小型讽刺性时事歌舞表演）“海岛居民”（笔者按：此处施罗德搞错了，格龙纳出演的是“豪猪”），然而他却没有任何机会去把他的兴趣变为现实——因为他有病。我那时对他很不理解。”

保尔·法色勒有肺病，大概从1954年起——那时格尔德10岁，正好是小孩子寻求在父亲面前尝试自己的能力的年纪——在莱姆戈的疗养院中度过他的大部分时间，他一直不停地咳嗽、发烧，而且极易从梦中惊醒。他于10年后去世。

小男孩格尔德，1950年进了韦尔费布克斯顿的一所小学，当继父在疗养院的时候成了“家中的男人”，很早就成熟了，相对其他同龄孩子来说更早地挑起家中的重担，在不到15岁的时候，就开始和仍然常来敲门的送传票的法警打交道，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的生活。他对家庭生活的组织能力表现在，每当有家务事要做的时候，他就一字一句地进行安排。“大多数时候都是他在指挥工作”，安塔和克莱纳引用他妹妹海德罗瑟的话说。那时候经济复苏的气息还几乎没有被觉察到。格哈德·施罗德回顾说：“我们长时间地依靠社会救济。什么在记忆中的烙印最深，什么就让人最敏感，直至今天当一些类似的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出现时，我立刻就回想起那个时代。”为了满足自己一些小小的心愿，年轻人开始在附近的农庄打工挣一点小钱。他帮助别人收萝卜，每小时50芬尼的收入，有时也用些生活必需品来支付，13岁的孩子就在耕地上开起了拖拉机。

“和谁的同龄人比起来他的青年时代要粗犷、狂野得多，但也要无忧无虑得多”，《镜报》记者于根·莱纳曼这样写道，他和施罗德做了很长时间的朋友（直到他在一次共同的晚餐会

上和妻子一起表示了他们在 1994 年联邦议会选举中对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夏平无条件的支持后，施罗德当即非常光火并断绝了跟他们的往来)。然而：家庭的贫困也给施罗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是一个好学生，但仍然不可能上文理中学：每天的公共汽车或者学费都让家庭难以承受。这个年轻人观察到，那些他认为比自己愚蠢得多的同龄伙伴，都能够直接升上高级学校，仅仅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薪水高一些。格尔德在青年基督教教会 (CVJM) 的集体晚会上遇到的那个神父对邻村那些考上高级中学的孩子特别照顾，而对打小工的孩子格尔德视而不见，安塔和克莱纳这样写道：“这真的激怒了他。”

他母亲希望儿子能走上一条公务员的道路。中学生格尔德于是在 1957 年冬天向联邦铁路局求职。“联邦铁路局年轻候补人”的录取考试在汉默尔恩举行。这个 13 岁的孩子通过了理论考试，但在实际考试中失利了：“那要求人必须用手摸来摸去。对此我并不擅长。”

格尔德，14 岁，怀揣着中学毕业证书，在莱姆戈跟着百货食品商奥古斯特·布兰特做起了零售商的学徒。今天的商店继承人汉斯-奥古斯特·布兰特，约 10 年前去世的奥古斯特·布兰特的儿子，和笔者聊天时回忆那时候的学徒格尔德：“我父亲对他完全满意。并且施罗德在 1996 年地方选举回来的时候，他还跟我们一起‘盘点’了一次呢。”格哈德·施罗德卖玻璃制品、瓷器、体育用品以及婴儿手推车，白天干 8~9 个小时——晚上负责给铺上漆布的地板打蜡。最初他每月收入 25 马克，第二年 35 马克，第三年涨到 55 马克每个月。这毫无前途，这什么也不是，根本无法让一个早慧的有清醒自我头脑的年轻人满意，他在自己 1993 年出版的《高级中学毕业考试》一书中对那段时期有过描述：“从那时候起权力开始令我神往，但在威斯特法伦当一个站柜台的学徒不可能给我提供进一步深

造和更好前途的机会，因此我想出去，换换地方，否则将一事无成。”

首先至少得去一个大一些的城市：施罗德 1961 年到了哥庭根—盖斯玛，租了一间房子并开始在弗塞特科恩铁器铺（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当一个售货员，他一直维持着与家庭和邻村塔勒的联系：一是他继续在那儿踢足球，二是后来成为他首任妻子的女朋友爱娃·苏巴赫还住在塔勒。

在哥庭根，施罗德集中精力在一家学院里进修课程，他在那儿报了名并在一年半中每晚去上学。在 1964 年夏天他拿到了中学毕业证书并计划好了第二条受教育之路，他去了齐根的一个城区外登瑙的齐格兰特教会学校，辞去了弗塞特科恩的活，以他作为战争孤儿的身份领取每月 200 马克的抚恤金生活。他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每门功课都合格了，在比勒费尔德的威斯特法伦教会学校，1966 年复活节，终于通过了高级中学毕业证书考试，这时他 22 岁。他对这个时期的总结是：“我在学习法律。”他想成为律师，他后来把对这个职业追求的动机描述为：帮助弱者，主持公平和正义。

寻找偶像的时代

我们很难找出促使他走上政坛的“关键性的生活经历”。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赫尔穆特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并成为他的第一个学习榜样。“首先，因为他在‘新闻界面前’操着一口熟练的英语，而我自己直到今天还不能如此纯熟地掌握；第二，因为他总能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联邦总理回忆起1994年在一个题为“星期天世界”的新闻访谈上的情况时说。这种敬重，是过去所未表现出来过的。对格哈德·施罗德来说，其政治理念几乎立刻受他的影响而有了发展，比起他的从前生活以及一个小城的售货员的前途追求来说要明显得多。在包括像德国经济奇迹重建时期的公众形势上一个聪明人的基本价值判断，不停改变和重新塑造的希望，从他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更多的对权力的认识，以及远未消除的社会对工种的歧视等等，这些东西都在他身上作用。

他在哥庭根当夜校学生时参加过各个政党在烟雾缭绕的小饭馆包间里举行的不定期聚会。“我曾参加选举的集会，而且无论是哪个政党，我总是站在对立面。我曾在左派和右派的政党都呆过，并出席过德意志帝国党的布比（即阿道尔夫，笔者按）·冯·塔顿的党代表大会。但那时我立刻感觉到，我不可能在我的政治生活的这种情形下高兴起来。这个党代表大会是一个闹哄哄的集会，但我才19岁，而且是我的分部领导将我带去的。刚开始觉得很新鲜，但紧接着我就感到一种可怕的无

聊”，他后来对记者彼特·夏特如此描述道。

自由民主党暂时地吸引了他的兴趣点，但他最终还是在1963年秋天——正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执政时期已结束，从14年的执政位置上引退——于那年10月15日决定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员并在有着左派传统的哥庭根分部领取了入党证书。他母亲，作为“一个天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以榜样作用引导他走出了这一步。（但爱丽卡·福色勒无论如何其实在1993年春天，当79岁高龄时才加入社会民主党，“为的只是在选举时能以成员的身份投我儿子一票”。）除此之外，“因为我差点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理论家，要不就是因为，对此可能一些人会感到吃惊，我觉得那时还是‘吹牛皮的施密特’很好。他那张嘴我很喜欢，那些对他政治生涯的批判争论很晚才开始，我曾坚决拒绝加入社会民主党”。作为未满35岁的成员施罗德自动地也属于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他每个月的党费是：1马克。

20年代初期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人还完全依照始于1952年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库特·舒马赫的精神，严格反对极权主义并直指两德重新统一的方针。在那个年代，和东德地区青年组织的接触简直不可思议。1964年青年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甚至中止了和比利时“青年社会民主党”的联系，因为属于这个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受自由德意志青年团（FDJ）之邀对民主德国进行了一次访问，并后在一个双方共同的决议中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社会民主党，尽管在1946年重组后立即明确表示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是在50年代由阶级的转向了全民的政党。

1959年对哥特堡纲领的抛弃更加确定了这一过程。新纲领的核心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人及其个性”。

新党员施罗德恰好跟左派的阶级斗争战士们截然相反。小

职员的个人身份自然令他自己颇为反感，“对别的人无法反诘，只能唯唯诺诺，听从命令”，“只有劳动者的整体地位得到提高”，施罗德当时这样分析道，对他自己的命运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赞成社会民主的立场。

安塔和克莱纳在他们的《格哈德·施罗德传记》一书中写道：“政治路线对社会民主党新党员施罗德几乎毫无意义，在铁器铺柜台后每天干活和夜校里拼命学习之余只给社会民主党留下了一丁点时间。但施罗德在周末却通常在为党务而奔忙，选举战中哥庭根的战友们挤在一辆大众汽车上穿街走巷下农庄。那时还没有驾驶执照的施罗德只好去管理大喇叭。”

但施罗德在工作中总是忘不了那个具体而远大的目标：1966~1967 学年冬季学期到哥庭根的乔治·奥古斯特大学学习法律。他的一个不愿泄露姓名的当时的大学同学现在是联盟的忠实选民，20 多年后 1998 年联邦议院选举时在下萨克森州施罗德竞选委员会中回忆道：“没错，那时的格哈德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并且他总是对权力有着强烈的追求。我知道，这样可以造就一个伟人。”施罗德开始总是早早地 8 点钟就去听讲座。当他已经习惯了大学生活之后，偶尔会睡到中午，夏天去露天游泳池消磨时光。

对于大学生的活动施罗德几乎从不放在心上：“我的确是由此受到一定政治影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能够左右这些运动，而决不只是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但那时我也留着长发——无论如何比现在要长。”虽然他也关注那些热点问题——诸如越南战争、紧急状态法、社会改革等等，更让他着迷的是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的著作。这些著作远离世俗，纯粹精英化的思考。他过去读书（现在也这样）常常是读些简略本子，不求甚解。因为“理论上的阶级斗争”他没有时间去从事：当他的出身于有钱家庭的同学们常常讨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无产

阶级”才能起来对政权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时，施罗德还只有靠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来维持他的学业。多年之后他把那段经历描述为一种特权：“在那里，我可以做脑力劳动而不必拼命苦干。”

1968年，在这个象征着背离固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形式的年份，这个24岁的大学生和比他小4岁的女朋友见习期的图书管理员爱娃·舒巴赫，结了婚。

与此同时他成为了哥庭根社会民主党下属地区委员会的一名委员，除此之外他还于1969年担任了哥庭根青年社会民主党党主席。那些对他日后地位非常有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惯用语，他不但从左倾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而且从这些著作的参考书目中，领会了不少。专注于地方政治建设的施罗德无疑是最大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只得到短暂的成果，就是接了他的班。他们的目标就是：“全力阻止右倾的施罗德！”因此他的政敌，现在的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议员德特勒夫·冯·拉赫尔，处心积虑地想从这个法律大学生手中把青年社会民主党地区领导权重新夺回来。但机关算尽，却反而在争夺哥庭根社民党党主席职务时一败涂地。这个野心家在决定性的斗争中以三票之差败北。一位左派的女战友居然拒绝给予他支持。她的名字就是：茵娥·魏提希-丹尼尔迈尔，以后曾做过联邦党财务主管。

而后一连串的闹哄哄的局面，虽然至少并非跟政治生活直接相关，却也严重扰乱施罗德的私人生活：他在青年社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中结识了社会主义高校协会活动积极分子安娜·塔森马赫，并且走得更远；在他和爱娃结婚三年后他跟她离婚并于1972年跟这位研究英国语言文学和罗马法学的大学生结婚。

他的论文题目是“一所医院的医疗主任是否可以因为他在一个未被禁止的党派有会员资格而被迫离职？”这样一个非常

有现实意义的颇具争议性的话题。1972年1月28日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的带领各联邦州政府对公共职务求职者的考察和招聘程序进行了讨论并起草了那个所谓的“激进公告”：“一个有敌视宪法的活动的求职者，不得招聘到公共职务上。如果一个求职者隶属于某反宪法纲领的组织，这种身份使人可以怀疑，他是否一如既往地赞成自由民主的根本秩序。这种怀疑可以成为用人机构依照规定拒绝聘用的合法理由。”

施罗德对此提出异议。他对所考的问题回答了“不”并在以后解释道：“从关于职业考核的政治讨论中我当时还不能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是更多地在于要有一个完善而公平的法律程序。

施罗德得到一份克里斯蒂安·斯达克教授的教学职位上的半职助教工作。同时在哥庭根老城区有了一间工作住所。他在汉诺威维尔纳·霍尔特法特律师事务所完成了作为候补官员的一个重要过程，霍尔特法特是党的一个朋友和过去德国国防军军官，还跟老的、国家的舒马赫的社会民主党有过联系。施罗德在哥庭根人的影响下跟他越来越疏远；他的偶像早就不再是赫尔穆特·施密特这个汉堡人心目中的元老，而是被从1969年起就在社会自由联盟的顶峰担任联邦总理的维利·勃兰特所取代。

这位1971年起成为汉诺威地区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的法学家（施罗德：“……我不愿意在任何场合坚持让人们对我施加过高的压力。”），1976年通过了第二次国家考核——这次甚至得到了“非常优秀”这个特别的分数。这位32岁的大学生带着光辉的前途正式成为了汉诺威维尔纳·霍尔特法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暂时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当中。此后他的重要任务是如何在长久以来分为无数派别的青年社会民主党中得到发展。施罗德拒绝了各种要求他为某一党派参加竞选的要求，他说：“如果我要进入领导机构的话，就只能是主席。”

统一青年社会民主党

因发令枪走火而起跑：当施罗德 20 年前当选为青年社会民主党主席时，德意志通讯社的一名记者注意到，一位“老兵”爬到了德国社民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位置。事实上，施罗德，他那时的头发不比现在长多少。1978 年 2 月 12 日在霍夫海姆/陶努斯举行的青年社会民主党联邦大会上，他就外型而言已经不是一个年轻的激进分子，而是一位 33 岁的已婚已获得律师资格的法学家了。按照青年社会民主党的章程，他两年后就不允许再任职了。施罗德是那种可以被称做“激进雅皮士”的人，也许还可以被称为“周末假革命家”。他与当时的妻子安娜约定：“平时，拥有绝对优先权的是在事务所工作的安娜——到了周末优先权则属于他这位青年社会民主党党员。”

作为青年社会民主党中“反修正主义”派的“军师”。施罗德和“反修正主义”的指导者赫尔穆特·科特一起致力于建立一个维护“雇员利益”的“社会主义派”。此外还有亲共产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源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代表克劳斯-乌韦·伯纳特，1977 年在汉堡当选为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他得到施罗德的反修正主义派支持；仅以 4 票领先于萨尔布吕肯的欧得马尔·施莱纳，德国社民党的候选人，受伯纳特前任海德玛丽·维克佐格一则约偏爱的改革家（“维克佐格一则约”至今仍被当时的对手嘲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宣传同共产主义者联盟。伯纳特在选举后不久就被德国社民党

开除出党，因为他拒绝放弃这一要求。接班的人群情激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宣称，“现在要这么做”。

1978年联邦大会以前的历史对青年社会民主党来说很重要，因为它表明的不仅是青年社会民主党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的典型情况。70年代由德国社民党执政的政府对于政治理论并没有太多的意向。1959年高得斯纲领党代会特别说明，是实用主义的形式是人民党内改变的结果，这种实用主义被有追求的青年社会民主党看成是意识形态上的赤字。在卡斯特·弗伊格特任主席职位期间，在学生抗议以及院外反对派的背景之下开始了社团的极左化。忠实于德国社民党的人，如来自莱茵兰-普巴耳茨州的鲁道夫·沙平，来自基尔的诺贝尔特·冈泽以及来自汉诺威的格尔德·安德斯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反修正主义都渐渐转入了守势。

让我们更近一点儿来观察这两股思潮：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派从汉堡、柏林和州联盟以及受社会主义高校联盟决定性影响的北下萨克森区政府发展而来。对于它的拥护者来说，国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与最初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它宣称是从列宁主义发展而来，受东德科学家重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这种当前的经济情况以“重要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大垄断集团手中”而出名。另一种表达为：国家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社会主义者只需将权力接收，以使一切在社会主义国家垄断之下变得更好。它的特征是“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和“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一理论不再提到议会体系。因此当时的青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约翰纳·施特拉塞尔已经在1973年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派讨论时提到，在内容方面与正统共产主义的德国共产党立场的区别在哪里。

反修正主义派，也被称为“汉诺威派”，源于汉诺威青年社会民主党的区政府，与正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相反，它深